

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的体会

卢烈红 郑自文 邹 薇

编者按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人类历史的深刻研究,作出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邃论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人类历史经历了由“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它不仅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启迪,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我校历史系李植枏教授在文科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史学思潮”专题中,采用启发报告——学生自学——课堂讨论——写学习心得的方式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个重要理论,运用理论、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着眼于从世界观方法论上培养学生观察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能力,认清世界历史发展大趋势,从深层次上解决一些思想认识问题,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从学生课堂讨论的发言和写的学习心得来看,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下面分别是中文系的卢烈红博士、法学院的郑自文博士、经济学院的邹薇博士学习这一理论的心得体会。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及其对语言研究的启示

在世界史研究领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偏向,这就是将世界历史视为各国历史的机械汇合或简单叠加。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着世界史学界,成为世界史专业工作者的思维定势,其它专业的研究人员和社会上的一般读者自然也就接受了这一观念,没有也很少有可能对它提出怀疑。本学期在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李植枏教授指导我们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并向我们介绍了著名历史学家吴于廑教授的整体世界史观。通过这些学习,我们才认识到,自己以前所接受的“世界历史”的概念并不科学,对“世界历史”这一问题作出了真正科学解答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内容丰富,从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费尔巴哈”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世界历史”是被作为一个独特的概念使用的。请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下列表述:“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从这些表

述中不难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世界历史”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经过“转变”、发展,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产生的,换句话说,“世界历史”是“转变”、发展的产物。当这种“转变”完成之前,地球上各国的历史就还不足以构成“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并不是地球上各国历史的机械汇合,即使当这种“转变”完成之后,情形亦复如此。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生产是终极的推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将生产、分工、交换、市场视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四大因素,认为是生产的进步导致分工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促使交换的扩大,交换的扩大推动市场的展拓,当生产的高度发展使分工越出国界,从而使交换国际化,最终使世界市场形成时,世界就联为一个整体,于是历史就“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在生产、分工、交换、市场这一连锁反应的链条中,视生产为起点,认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终极推动力是生产,这一观点,鲜明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

再次,与把生产看作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终极推动力相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大工业对这一转变的作用。他们明确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纵观历史,正是由于大工业促进了各国内部和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各国的经济互相依赖,从而将世界联成为一个整体,掀开了世界历史的第一页。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承认战争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他们说:“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征服者很快就学会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接受了他们的教育和风俗。”马克思、恩格斯对战争的看法,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确实,站在历史的高度从世界全局着眼审视征服性战争,不难看到,一方面,征服性战争带有很大的破坏性,是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但另一方面,它们对历史的发展却并非毫无作用。以19世纪以前历史上的征服性战争而论,其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先进的民族征服落后的民族,往往把先进的技术,甚至一些进步的观念带给后者,从而促进了落后民族生产方式的变更;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往往被先进民族所同化,从而改善了自身的生存状态;而这种交往和互相影响正是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一大促进因素。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科学揭示了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的发展规律,是研究世界历史的指针。吴于廑教授正是在认真领会这一理论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向将世界历史视为各国历史的机械汇合的传统观念挑战,力倡用整体观点研究世界历史,认为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世界从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过程及其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不仅对世界史学科的研究工作有指导作用,启迪吴于廑教授提出了整体世界史观,也为其它学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我们语言研究的启示是:应该加强汉语的宏观研究,扩大视野,以世界上其它民族的语言为参照系,研究汉语与汉民族文化的关系。循着这样的思路从事汉语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独特面貌所由形成的文化土壤和汉民族文化特征的语言印迹。这里,我们简单地提两点:

1. 人类由采食经济转向产食经济,是沿着两条道路分化的,一条道路是在驯化植物的基础上建立起农耕社会,一条道路是在驯化动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游牧社会。后来,在一些海洋民族

那里,商业成为经济生活中举足轻重的部门。汉族先民的社会区别于世界上其它的游牧社会和重商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农耕文明早熟而高度发达,以农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延续甚久,这种状况在语言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古汉语词汇中,谷物的分类词很多,区分很细,例如,既有“黍”这个词,又为黑黍立一专称:“秬”,甚至还给黑黍中的一个小类——一壳中有二米者起了个专名叫“秠”。牛在古汉语词汇中也有很发达的分类词体系,如:一岁之内的牛叫“犊”,二岁的牛叫:“犗”,三岁的牛叫“犝”,四岁的牛叫“犗”,纯白色的牛叫“犗”,黄白色的牛叫“犗”,黄色而有虎纹的牛叫“犗”,黄毛黑唇的牛叫“犗”。不难理解,只有农本社会才有对谷物和牛进行详细分类的必要和可能,而谷物和牛众多的分类词正是农业文明的语言化石。

2. 古代的汉族社会从社会政治方面来看是以家族为本位、重血缘关系的宗法社会。宗法社会对汉语面貌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影响了汉语的亲属称谓体系。汉语的亲属称谓体系有两大特点:A、亲属关系拉得非常长。据《尔雅》,古代的宗族称谓囊括十三代,即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王父、父、己、子、孙、曾孙、玄孙、来孙、鼻孙、仍孙、云孙。B、亲属称谓区分得非常细。在英语中,伯、叔、舅舅、姑父、姨父只用一个词表达,伯母、婶母、舅母、姑妈、姨妈也只用一个词指称,而在汉语中,这些对象都被严格区分开来,各有专名。亲属关系拉得长,是人们重血缘关系的一种表现,亲属称谓区分得细,则表明人们抱有亲疏有等、内外有别、父系和母系亲属不容混淆的观念,二者都充分体现了宗法社会与亲属称谓的血肉联系。

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对世界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对其它学科的启示是珍贵的,运用这些启示开辟各学科研究的新天地,这是一个大有作为的方向。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社会主义在当代的命运

黑格尔曾说:“熟知并不等于真知”。狄德曼也曾断言:“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东西,每每注定是人们知道得很少的东西”。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便是这样一种被人们经常提及却并不被人们所深刻理解的理论。

一、马克思“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的真谛

正如人类社会必须要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一样,人类也必然要越过资本主义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前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也曾致力于为劳苦大众构想和描绘一个美妙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但因他们未能彻底摆脱以往历史上思想家痴求终极真理和完美图式的思维方式,寄希望于宣传、示范等手段达成这一目的,注定了其设计一开始就成为一种善良的空想。

马克思之所以能超越前人走向历史深处,在于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解剖”,从人类社会的历史趋势和发展前途的角度,指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趋势和共产主义发生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并最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等文章中阐明了共产主义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密切联系。

首先,马克思论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基础。作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

其次,马克思论述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真正原因是生产力与分工的高度发展。正是由于大工业即社会化大生产“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由于“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孤立状态”,形成了“民族国家”,才促使了历

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完成开创世界历史使命的则是资产阶级。

再次，马克思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真实涵义：从横向上看就是指建立在生产力和分工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间的普遍交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都不可独立于世界历史轨迹而发展；从纵向上看，就是指在前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分工的基础上，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而“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则决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冲破国界走向世界。

第四，马克思认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一个过程。世界发展为一个整体并非自然溶合的结果，“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第五，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关系，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并在此意义上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根据交往发展程度，马克思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大社会形态，这就是，与狭隘地域性历史相适应的是人对人依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相适应的是人对物依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世界历史完全统一的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二、理论的启迪与现实的思考

1. 历史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胜，一些落后国家之所以替代发达国家先行“跨入”社会主义行列，尽管原因很多，但却都必定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直接有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则为人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矛盾运动时提供了一个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广阔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新视野、新视角，从而避免了囿于狭隘民族范围的方法论局限。根据马克思上述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合乎逻辑的结论必然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考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既不能局限于各个单一民族国家，也不能停留在思维抽象上，而必须着眼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达到国别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的思维具体。

以此考察世界历史进程，可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没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根源在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而同时，正因为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行程还没有完成，才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才存在着“落后先行”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2. 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主要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外壳所不能容纳的地步。正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才使得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具有“弹性”和“螺旋式”的特点，也正是由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又使得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世界范围内铺展和延伸，并由此派生出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既是发生在资本主义由不成熟向成熟阶段过渡中激烈动荡的历史时刻，又是发生在人类已经达到自我意识即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产生并传播开的时期。于是在资本主义统治较薄弱地带的无产阶级循着历史的轨迹率先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生产的社会化特别是生产的全面社会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成熟的标志，也就必然是共产主义来临的先兆和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必然结果。

3.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每一个民族同其

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贫穷的普遍化”只能使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所以，已经取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国家，必须冲破国际资本的包围，主动地走向世界，大力发展生产力，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才能真正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才能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获得世界历史性的真正存在。

4.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质决定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必然会冲破国界走向世界。但同时，世界性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最终形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彻底实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各种差距的最终消除，既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也并不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性的完全丧失和世界的完全融合。自世界市场出现之日起，个别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已不再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而是日益转化为有机整体与有机构成部分的关系。世界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不仅不排斥各国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反而要以此作为基础。因此，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行程彻底完成以前，各个国家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该受到尊重。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集中精力办好本国事情，不仅是实现国际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世界历史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彼此开放，共同繁荣”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作为有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各民族国家行为的基本准则。

5. 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曲折和失误，从世界史的高度和过程看，只不过是暂时的困难和磨难，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推移，社会主义作为真正的历史大趋势终将突破历史强加给它的局限性，使自己的内在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表达出来。

整体世界史观对当代经济发展的几点启示

世界历史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发展和世界交往，尤其是经济领域交往日益丰富、扩展和累积的结果。历史经由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从原始的、闭塞的、各个分散的人群集体历史，发展为彼此密切联系的一个全局的世界历史，实现了世界历史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的转变，即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大都信奉五种生产方式说，以为世界各国、民族大体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五种生产方式，以单个国家或地区的分散演进为特征向前发展，而对于世界历史的总体认识却是个混沌的“黑箱”，学习吴于廑教授的著作后，世界历史作为一个纵横交织、环环相扣、整合一体的宏阔长卷豁然呈现眼前。从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演变考察，人类历史进程包括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两个相互作用的方面。纵向发展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不同的社会形态的更迭”，横向发展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纵向发展的水平与程度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与广度，而横向发展的扩大往往大大促进与深化纵向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因此，可以说以交往为核心的横向发展强劲地推动着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

这种唯物辩证的整体历史观，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探索中国在当今及下个世纪的国际背景下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宏观战略，无疑地具有十分深刻的启迪意义。

1. 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历史阶段,这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的逻辑结论。在人类历史中,横向发展的重大转折始于15、16世纪,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海上交往的空前突破,各地区、民族、国家间的闭塞状态结束了,间接间歇的交往转变为直接频繁的全球化交往,狭窄局部的交往转变为全面广泛的交往,简单的国内商品交换扩展成广泛的跨国间的国际商品交换,市场经济在深度、广度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由此奠定了西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中国,尽管唐、宋时代工艺、技术、文化领先于世,可14、15世纪以后的几个世纪都没能跨进近代化的门槛,而渐趋落后衰微。对于这个令人难解的“李约瑟之谜”,中西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尽管尚无定论,但我认为至少可以肯定,中国之落后于西方决不在于是否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在于传统的封建体制是否为市场经济在国内、国际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支持和现实可能性。

从发展中国的经历来看,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也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二战后大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发展中国家空前扩大,但经济上与发达世界还有极大差距。50、60年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遵循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忽视以至扼杀市场机制的作用,结果尽管在初步建立工业体系、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却也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如农业停滞,农业生产率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机制作用极为有限等等。现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都从强硬的低效的计划管理模式下解脱出来,走向市场经济,最充分地利用市场价格的资源配置机制,并由此增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固然,市场经济并非十全十美,这正如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经济危机所显示的一样,存在着“市场失灵”问题。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决不等于重蹈覆辙,而是要利用政府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对市场机制进行管理,建立适合国情的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步步突破传统体制束缚,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国家引导市场、市场调控企业”等改革模式,直到最后形成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伟改革目标,这充分表明,我国要改变落后状况,实现本世纪直到下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必须大胆地进行体制创新,义无反顾地发展市场经济,这是必然的历史抉择。

2. 对外开放是经济由落后走向繁荣的必由之路,这也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理论所蕴含的逻辑结论。15—16世纪海道大通结束了前资本主义时期各地区、国家、民族,包括欧、亚、非旧大陆与美洲“新大陆”之间的隔离、闭塞状态,开始了以经济联系为主要方式的世界交往。19世纪上半期后,随着产业发展对原料、市场需求膨胀,亚、非、拉国家急剧卷入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流通中来,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分工、发达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的分工。到19—20世纪之交,以西欧资本主义世界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整体出现,从此一切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这一方面说明西方世界的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其对外掠夺性的经济交往,另一方面说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试图在自给自足、闭关自守、互相隔离的局面下发展其民族经济,个别国家的经济始终是并且必然是世界经济整体中一个有机部分。

二战之后到60年代初,刚刚取得民族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商品交换中处于不利地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并未象它们所宣称的那样通过“涓流效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好处,相反地出现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两极分化结果,迫使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内向型的封闭式战略,一方面强调自力更生,在国家计划保护下建立本国工业体系,另一方面逃避国际竞争,试图通过僵化的物资分配实现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然而这种封闭观点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冲突

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不断地在时间上延伸、空间上拓展,要求从国内走向国际,从孤立走向相互开放、相互联系。60、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正确的战略是把握时机,积极加入国际市场,只有在国际竞争中才能使国内企业摆脱国家保护的温室,才能根据自身的优势,按照国际准则和国际标准来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本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整个国际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东亚的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韩国在70年代率先转向对外开放、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结果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超过美国、日本和西欧,以咄咄逼人之势成为国际市场上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步“东亚四小龙”之后尘,目前东亚的泰国、印尼、南美巴西等国也都实行了外向型战略的根本转变,并正在取得显著的成绩。

我国建国以后长期遵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给自足的发展经济道路。改革以来,逐渐开放了沿海一系列工商业城市,并建立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目前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三资企业增长强劲,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久的将来中国可望恢复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合法地位,中国已越来越融入亚洲以至世界经济体系之中,进一步深化改革与开放是巩固既有成就,力争更大更持久发展的关键所在。

3. 科学技术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动力,也是人类历史未来发展的重要源泉。历史之转变为世界历史是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的。15—16世纪海道大通,航运技术大发展,“欧洲的海洋探险家把有海上联系的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一气,为欧洲船舶打开了除两极地区以外的所有海域,”由此,从根本上突破了农耕世界自然经济的封闭性,使多年来分散发展的历史逐步转变为整体发展的世界史,18世纪60年代始于英国的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由此国际分工、国际交换、世界货币、世界市场作为同一过程的四个方面形成和发展起来,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19世纪后期,以电力、汽车制造、钢铁、化学等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进一步扩展了市场经济与国际交往的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商品交换越出工业发达国家,触及到亚、非、拉广大初级产品生产国。19、20世纪之交,以西欧为中心、为帝国主义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所缠绕的整体世界终于最后形成。

在西方资本主义先后两次产业革命后,中国的科技和生产力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可同日而语,而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差距导致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与作用的巨大反差,这是至为深刻、沉重的历史教训。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的科技革命,以微型计算机、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光纤通讯等为代表的新科技成果不断涌现,“信息时代”的来临空前地缩小了国家间的自然距离,世界历史日益整合成为一部“地球村”的历史。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能否抓住时机,大力推进科技研究及其和现实生产力的转换,决定着我国能否在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进而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

总之,20世纪是更伟大的人类历史的转折时期,在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跨入21世纪的时候,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必须迎接挑战,大力推进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促进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积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汇到国际经济的宏阔体系中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世界历史的鸿卷中写下壮丽的一页。

(责任编辑 吴友法)